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老龄化治理困境、逻辑和路径

王进伟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2日

摘 要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和治理路径。研究认为, 目前的困境是由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自身再生产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的。与资本逻辑下的个体化方案相比, 中国应对老龄化应该是一项以调整社会再生产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系统工程。核心就是把“人口高质量发展”统筹起来, “两种生产”相结合, 把压力变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长寿红利”。实践路径有创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银发经济、创新制度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培育积极老龄文明等, 以此来探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治理之路。

关键词

“两种生产”理论, 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治理, 人口高质量发展, 长寿红利

Dilemmas, Logic and Paths of China's Aging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Jinwei W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2,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arxist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governance approache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current dilemmas stem from structural imbalances between the reproduc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itself. In contrast to individualistic solution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China's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should be a systematic project aimed at adjusting social re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core lies in coordinat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ng the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so as to transform aging pressures into the "longevity dividend" suppo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al path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full-life-cycle service system, developing a people-centered silver economy, innovating institutions to activat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and fostering a positive aging culture, thereby exploring a governance approach that reflect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Keywords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Population Aging, Aging Governance,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ongevity Dividen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影响最深远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¹。该过程表现出“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等严峻的特点，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系统性的挑战，也引起了怎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之路的“中国之问”。

目前主流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主要针对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服务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展开研究。该种“技术治理”范式虽然有现实意义，但是常常忽略了老龄化现象产生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且不能分辨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应对逻辑的不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给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该理论认为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两者辩证统一，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1]。因此要把老龄化放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里，考察它怎样被特定的生产关系所塑造。在社会主义中国，制度本质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应对老龄化的主要目的，这就给开发长寿红利赋予了根本可能。

2.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及其老龄化分析维度

要深刻认识并妥善处理好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透过现象看本质，即看它是“社会问题”还是“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依靠的两种基础，又指明了人口规律(包括老龄化)的历史具体性，为我们认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老龄化逻辑、构建中国的本土化分析工具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 理论溯源与核心内涵

“两种生产”理论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关键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最终都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为生产这些而

¹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mc_cid=1f38383161&mc_eid=8d0c6f16c3

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殖^[1]。这一表述把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活动分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方面。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决定物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人的生产即人口再生产，它不只是个体的繁衍和代际的更替，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延续、文化的传承^[2]。

两种生产辩证统一、相互制约，物质资料生产给人口再生产提供生存和发展条件，人口再生产给物质生产提供劳动力和消费主体，数量、质量、结构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形态。恩格斯认为，“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方式的制约，即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和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1]这表明不存在超历史的永恒人口规律。

人口过程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再生产模式，也决定了老年人在社会再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分析老龄化问题要立足于“两种生产”互动的具体历史形式，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经济结构。

2.2. 制度分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老龄化逻辑

按照“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具体性原则，老龄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产生逻辑和社会含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物质资料生产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人口再生产也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求。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小甚至为零，但是劳动力的供给却在不断增加，从而产生了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老年人口常常处于两种困境之中，第一种是劳动能力被资本所剥夺之后，会被归类为“停滞的过剩人口”，成为需要救济的赤贫阶层，晚景异化为个人的风险和财政的负担；第二种是资本主导的养老服务体系(私有化养老金市场、高端养老地产)，把老年人的需求变成利润的增长点，加大了养老资源获取的不平等。老龄化被视作需要进行“管理”的成本和危机。

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在此制度之下，老龄化虽然带来了压力，但是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压力来源于两种生产快速转型过程中暂时的、结构性的不匹配，而不是制度性的排斥和剥夺。因此应对老龄化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完善社会政策和文化建设把庞大的老年人口变成“长寿红利”。即把老年人看作可以开发的“创生性资源”，而不是消耗性的负担；以老有所为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普惠公平的银发经济来满足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需求。社会主义制度给这一转变赋予了根本保障，把应对老龄化当作改善社会再生产、达成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

2.3. 构建三维分析框架

为了把“两种生产”理论应用到中国的老龄化治理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主要方面的分析框架，试图发现老龄化背后“两种生产”互动失衡的具体形态，给后面困境分析和路径探寻赋予理论支撑。

第一，结构失衡，即人口再生产年龄结构同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快速老龄化、少子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老年抚养比提高，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加大了社会保障体系财务可持续压力。本质上就是人口再生产向现代类型的转变，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传统的需求出现的断层。

第二，供需失衡，即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同相关物质、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养老领域中第

一种生产滞后的一个体现，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价格适中的优质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缺乏，供需错配十分明显。表现为农村和社区养老设施严重缺乏，医养结合发展缓慢，医养两张皮现象突出，市场供给重利益轻质量，高端化和普惠性服务相分离，服务链条有断点等。

第三，价值实现失衡，即老年人人力资源潜力同现有的制度、社会观念之间的矛盾。许多低龄、健康、有技能的老年人仍然有参与社会生产的能力和意愿，但是强制性退休制度、就业年龄歧视造成劳动参与排斥。数字鸿沟造成数字排斥，消极的老年观把老年人问题化、边缘化，抑制了老年人人力资源再开发。

因此，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三维分析框架，给破解中国老龄化治理现实问题赋予了有力的工具，本文将在后文按照此框架进行分析。

3. 现实困境：基于“两种生产”三维框架的中国老龄化治理剖析

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所建立的三维分析框架应用到中国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下老龄化治理所遭遇的诸多、交织的困境。这些困境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点，是“两种生产”在特定历史时期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构性失衡的具体体现，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矛盾和张力。

3.1. 结构失衡之困：劳动力供给与养老负担的双重压力

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国老龄化直接的挑战就是人口再生产年龄结构快速老化同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规模、结构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失衡既从供给端也从需求端压缩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

在供给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已成定局。快速的人口转型带来了人口增长率下降、抚养比结构变化和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3]。尽管有研究指出，在特定区域和条件下，老年抚养比可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这往往伴随着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正向溢出效应的削弱，反映出深度老龄化可能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4]。更普遍的研究结论是，当人口老龄化跨越一定门槛值时，劳动力供给数量、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正效应均呈现递减趋势，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5]。这本质上是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高寿命的现代类型转变)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数量、年龄结构的传统需求之间出现的断层。

需求侧主要表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压力。养老保险本质上就是代际“现收现付”的契约，制度赡养率下降会导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枯竭的风险[6]。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压力，2025年到2035年之间延迟到65岁(每年延迟6个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50% [7]，但是不能根治。根本出路就是实现人口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依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强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为养老金体系奠定物质基础，也说明解决结构失衡要同教育、科技、产业升级等改革一起推进。

3.2. 供需失衡之困：银发经济有效供给不足与体系割裂

第一种生产在养老领域中滞后、脱离，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衡。失衡不是单纯的缺少，是供给端在结构、质量、体系上同老年人真实、多层次需求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错配。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 2017-2018)数据可见，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实际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缺口：例如，64.3%的老年人希望获得居家护理服务，但仅10.2%的老年人报告其社区实际提供此类服务；67.3%的老年人希望社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仅12.1%的社区有所涉及。这从微观层面具体呈现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类服务“供需偏离”的典型样态，印证了结构性错配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广泛的数据支撑[8]。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缺位严重,并且城乡分布不均。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但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尤其是农村地区严重不足。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但是养老资源最匮乏,出现了福利错位、设施规划不合理造成的“闲置与紧缺并存”的现象。城市内部也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资源过度集中在机构养老上,普通老年人所能够承受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民政部门调查表明,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农村是最突出的短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和专业化水平低[9]。

其次,医养结合长久以来就存在“两张皮”的体制梗阻和要素短缺问题。失能、半失能老人刚性需求依靠医养结合来解决,但是实践中存在许多障碍。一是管理体制分割,养老、医疗、医保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资源不能融合,合作大多停留在协议层面。二是缺少支付机制,长期护理保险还在试点阶段,覆盖面小,很多老人得不到稳定的支付保障。第三是人才匮乏,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有4000多万,持证护理员仅50万,待遇低、认可度低,流失率高,从业人员“三低三大”持证率低、服务质量难保证[10]。

最后市场供给盲目,存在数字排斥的新壁垒。银发经济产品同质化严重,很多“伪适老”产品功能重复、操作繁杂,不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智能技术普及形成“数字鸿沟”,老年数字融入遇到技术更新同生理认知衰退之间的矛盾,数字生态同需求匹配不够的情况也存在。复杂界面、隐蔽操作、广告干扰、信息安全等都会使老年人被排除在数字服务之外,加大数字时代的机会不平等。

3.3. 价值实现失衡之困: 制度排斥与老年发展权利受限

如果说结构失衡、供需失衡更多是物的层面,那么价值实现失衡就是指人本身被排除在再生产之外,被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所压制。

劳动参与排斥,制度性门槛与市场年龄歧视并存。大量低龄、健康、有经验的老年人是宝贵的“银发人力资源”,再开发存在双重障碍。一是制度衔接不到位,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要与就业、社保等配套制度相协调,目前超原退休年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缴纳等方面还存在障碍。二是普遍的就业年龄歧视,高龄求职者会遭遇明显的统计歧视和偏好歧视,能力相当的情况下需要投出更多的简历才能得到面试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贫困”使劣势更加严重,数字技能成了无法跨越的门槛。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在鄂西南山区金龙坝村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时,虽然“初老助老老”的模式有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养老供需失衡、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有限、外部社会力量介入不足等问题,使得部分低龄老年人虽有参与意愿,却缺乏制度化的价值实现路径,反而加重了其照护负担,反映出价值实现失衡在农村地区的特殊表现[11]。

数字排斥和社会参与排斥,消极的老年人观和缺乏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文化中存在着“年龄歧视”以及消极的老龄观,把老年人看作需要被照顾的“负担”,忽略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创造价值的潜力。它被老年人所接受,但是造成了老年人的心理数字鸿沟,导致老年人害怕失败、缺乏自我效能感,从而主动规避数字技术。虽然已有研究显示社会参与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衰老态度,但是在现实中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以弱连接型为主,缺少常态化的、制度化的渠道,社区活动内容单一,不能满足老年人深层次的需求。

缺乏家庭的支持,传统养老功能结构性衰退。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养老功能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急剧衰退而大大减弱。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导致大量的空巢、独居老人出现,4-2-1的家庭结构使得传统的代际支持模式难以维持,家庭养老资源传递断裂,迫使社会寻找新的支持模式,同时也体现出建立多元协同照护网络的必要性[12]。

综上所述,在“两种生产”三维分析框架之下,中国老龄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可以被拆解成宏观结构、微观个体、物质基础和权利实现四个方面的立体图景。这些困境互相联系、互相加强,核心就是深化社

会领域改革，系统调整“两种生产”的互动关系，把老龄化压力变成发展的动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4. 路径探索：中国的老龄化治理的系统方案

面对“两种生产”互动失衡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中国所采取的不是零敲碎打式的政策修补，而是要从长远出发，系统集成，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社会工程。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把老龄化仅仅看作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或者“财政负担”的狭隘视角，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全局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来指导建设一个可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两种生产”动态平衡、最终把“长寿压力”变成“长寿红利”的治理体系。

4.1. 根本立场与核心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与“两种生产”的再平衡

中国的老龄化治理的根本立场，就蕴含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里。该定位把老年人福祉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摆脱了西方福利国家把老年人当作被动受助者的传统模式，确立了其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地位。治理核心逻辑，就是依靠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来调整、优化“两种生产”的互动关系，使它由原来的失衡状态变成新的平衡状态。

这一逻辑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人口自身生产由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转变、人口自身生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人口自身生产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在生育率转变的背景之下，重点已经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在于通过优生优育、全民健康、终身教育等方式，提高人口素质、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13]。二是使物质资料的生产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供给，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和老年民生改善同频共振。²三是重新塑造社会生产关系，打破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性、文化性的排斥，营造出一个年龄包容、代际和谐的环境，激活“银发人力资源”。最终目标就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把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银发力量”^[14]。

4.2. 路径一：夯实物质基础，发展以人为本的银发经济

养老服务领域严峻的“供需失衡”必须把发展银发经济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绝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或者产业化，而是强调“普惠性”和“适老性”，保证经济增长成果真正惠及广大老年人。

首先加强规划引领，创建起覆盖城乡、普惠可达的服务设施网络。要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提前做好规划、动态调整，使养老服务设施在城乡规划中占有的用地和空间比例得到提高。重点加强基层建设，推进资源下沉，形成“县级综合平台、乡镇区域中心、村(社区)服务站点”三级网络，使服务更加贴近老年人。尤其要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依靠整合闲置资产、推行互助养老等方式，破解农村养老“空心化”难题。但在大力推进银发经济的过程中，也应警惕资本逐利带来的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可能出现服务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齐、弱势群体被市场边缘化等问题，进而加剧养老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因此，需要在产业扶持政策中嵌入公平性审查机制，确保普惠性目标不被利润最大化逻辑侵蚀。

第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来破解医养康养融合发展难题。关键之处在于冲破部门壁垒，让卫健、民政、医保、人社等系统政策协同、标准互通、资源整合。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和全国推广，建立稳定的支付机制，给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提供根本保障。同时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设，完善养老护理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薪酬待遇，提高养老护理员的社会地位，吸引和留住养老护理员。同

²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501/content_6998122.htm

时，在医养结合推进中，应关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获取公平性，防止因财政投入偏向大城市而造成新的区域分化，使制度红利真正覆盖全体老年人。

最后引导产业供给侧改革，给老年人提供价格合理、质量可靠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政府可以制定标准、发布推广目录、给予研发补贴等方式促进企业研发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操作简单的产品，防止出现伪适老、盲目追求高端化的现象。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家庭养老床位等普惠服务，用消费补贴、政府购买服务来降低老年人的消费成本，释放内需。并且对于数字化辅助实施数字适老化改造，设置老年模式在强制性的公共服务平台中。

4.3. 路径二：创新制度安排，激活老年人力资源与重构支持体系

对于价值实现失衡、家庭功能弱化问题，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层次调整和制度创新，给老年人参与社会、实现价值扫清障碍，创建起多元协同支持网络。

核心就是创建包容性的劳动就业制度。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也要同步优化就业、社保等各方面的年龄限制政策。这就要求确定超过原退休年龄、处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劳动者法律身份、劳动合同关系和社会保险缴纳办法，消除用人单位用工的法律风险和顾虑。需特别警惕的是，激活老年人力资源不能以牺牲老年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应通过专项立法明确禁止招聘、晋升、培训等环节的年龄歧视，设定企业雇佣老年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底线，防止出现“低薪雇老”“超时用工”等剥削性用工现象；同时需兼顾代际公平，避免老年劳动力过度挤占青年就业岗位，可通过岗位分类引导(如经验型、顾问型岗位优先向老年人开放)、企业雇佣补贴等方式，平衡不同年龄群体的就业需求，缓解潜在的代际竞争。此外，鼓励企业开发技能传承、督导咨询等“适老岗位”，推行弹性工作制，政府可对获评“老年友好企业”的市场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二是创建新的社会参与和互助支持模式。大力推行银龄计划，给老年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开辟出宽广的智识舞台。在社区层面大力推行时间银行等互助养老模式，用数字化平台实现低龄老人服务时间储存和兑换，创建起可持续的邻里互助网络。对于家庭养老应该出台实质性的支持政策，推行子女护理假、提供喘息服务、对赡养老年人的家庭给予税收减免或者补贴，帮助家庭巩固养老的基础地位。

三是构建起多层次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基本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的基础上，用划转国有资本、提高基金投资运营收益等办法做大储备“蛋糕”。加快发展企业(职业)年金、鼓励个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形成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满足老年人不同的收入保障需求。

4.4. 路径三：培育积极老龄观，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与文化

观念就是行动的向导。必须发起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彻底改变把老年人当作社会负担的消极认识，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积极老龄观。

首先要加强老龄化国情教育和媒体引导。要把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培训课程，提高全社会对老龄化规律、挑战的科学认识。媒体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改变对老年人的刻板化、边缘化的表现方式，多宣传老年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终身学习、积极向上等生动的故事，塑造出一个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老年新形象。但在倡导积极老龄观的同时，也要防止将“老有所为”异化为对老年人的变相强制劳动，避免忽视那些因健康或家庭原因无法参与社会劳动的老年群体的合理需求，以免形成新的社会压力与心理负担。

二是发展老年教育，繁荣老年文化。推进老年大学、社区学校的提质扩面工作，把课程由娱乐型向赋能型转变，开设数字技能、健康管理、金融防骗等实用课，让老年人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老年人成立各种文艺团体、兴趣小组，参加文化创作、表演活动，保证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权益，让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变为现实。而在此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避免因经费和场地不足导致农村及低收入老年群体被排除在外。

三是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实现代际融合。将孝亲敬老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去，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在社区、基层开展孝心课堂、代际对话、祖孙同乐会等有利于增进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理解、情感的活动。推进公共空间、社区环境的适老化、全龄化改造，创建跨年龄协作的共享空间，最终形成不分年龄、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5. 结语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的老龄化在结构、供需和价值实现这三个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困境本质上就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互动失衡。破解之法在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两种生产”动态平衡为根本逻辑，开展系统治理。这就需要我们三管齐下，从物质上夯实普惠型银发经济的基础，从制度上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和重塑家庭社会支持网络，从观念上培育积极老龄观，创建代际融合的老年友好型文化。只有依靠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深层次的变革和重塑，才能把老龄化压力变成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出长寿红利的作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成功之路，使亿万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的“银发力量”。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16.
- [2] 胡刘昱洋, 成林. “两种生产”共同推进文明演进[EB/OL]. https://cssn.cn/mkszy/mkszy_mkszyjbl/202304/t20230427_5625190.shtml, 2026-07-15.
- [3] 袁蓓, 黄伟. 我国人口转型过程中人口与劳动力年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J]. 中国劳动, 2016(12X): 55-58.
- [4] 李新光, 陈燕和, 江喜林, 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J]. 人口与发展, 2020, 26(5): 85-96.
- [5] 宋佳莹, 高传胜.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劳动力供给与社会保障支出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11): 1-18.
- [6] 王翠琴, 岳晓, 薛惠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仿真测算[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2): 131-135.
- [7] 张苏, 张辉.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4): 23-44.
- [8] 黄启原, 李颖, 许昕, 等. 基于 CLHLS 的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21, 36(3): 5-9.
- [9] 张思锋, 张恒源. 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状况分析与建设措施优化[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 8(1): 88-106.
- [10] 魏颖, 傅娟. 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医养结合发展的实践成效、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 2025(23): 62-65.
- [11] 黄小殊. 鄂西南山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以金龙坝村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恩施: 湖北民族大学, 2023.
- [12] 邓婷鹤, 毕洁颖, 聂凤英. 中国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研究——基于家庭养老视角[J]. 南方经济, 2020(4): 84-99.
- [13] 陆杰华, 孙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1): 179-190+287-288.
- [14] 孙雪霏. 护航银发再就业 激活老有所为新经济[N]. 中国城市报, 2026-03-30(005).